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提问：张 伟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党委书记、副站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请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对文化领域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如何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解读：张 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文化领域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与对象，即本身就是治理对象；另一方面因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对其治理更强调要用文化的手段与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信息化条件下，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要求我们必须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日新月异，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活力迸发、充满希望的信息时代。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前所未有”来概括，即“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科技成果所难以比拟的。互联网发展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深刻调整是前所未有的，给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文化领域而言，技术的变革、发展与应用带来传播方式、产业格局、文化业态的深刻变化，极大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和价值观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根据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推动文化领域的治理理念、政策规划与制度设计、路径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在治理理念上，必须尊重信息化时代的文化生产规律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将生产视为一种意义结构，并将生产放在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流通等社会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其价值。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性有方法论意义。信息化条件下，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生产，也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流通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文化生产我

们一直给予高度重视。那时的文化格局中，传统媒体垄断着信息的发布权，知识精英代表着公共舆论中知识信息的权威性，广大人民群众则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格局下，文化符号生产链条中，谁控制生产端，也就控制了信息的整个流通。但互联网和新媒体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机制，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跨学科发声，人民群众文化趣味的快速更迭，尤其是我国网民规模已逾11亿人，每个人都能借助技术的红利在互联网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加入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中，展现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文化趣味，这一切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网红、直播、流量明星等固然带来新奇与乱象，同时也昭示着我们在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面临的深层次文化挑战是高度复杂的。在当今时代，如果还认为符号信息的生产、流通与接收有着固定的同一性，以为加强治理就是简单追求管理的全面覆盖、简单地“删号”“封号”，无疑是治理惰性的体现。

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只考虑文化生产层面信息的真实性，不重视意义流通层面产生的传播效果，会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冲击甚大。哪些信息能被更多看到，哪些信息在意义流通中被“过滤”，哪些负面信息通过转化能产生正面效果，哪些正面信息会产生负面效应，这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既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改变处于过往路径依赖的文化领域治理方式，更新文化治理理念，寻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逻辑和手段。

质言之，变革是互联网技术兴起与普及给文化领域治理带来深刻变化的内在要求。变革所指向往的，就是那些尚未被理论言说，甚至无法被有效识别的阻碍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体制机制。唯有变革，才能真正增强文化领域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提升文化治理能力。

在政策规划和制度设计层面上，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当前，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

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网络媒体具有跨时空、大容量、开放性、交互性、移动化等传播特点，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主平台。新的文化产品类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比如网络文学、网络表演、网络影视剧、网络音视频、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

在资本的逐利趋向和流量加持下，文化市场难免出现一些畸形现象，甚至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庸俗化、媚俗化乃至低俗化表达的乱象。比如，粉丝经济驱动下“饭圈”文化不断壮大并蔓延至社会各领域，流量逻辑从网络世界走向现实社会，对社会治理和传统文化行业构成挑战等等，不一而足。从文化领域治理的角度，这就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种改革，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等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是对主体间彼此关系的“规范化表达”。之所以要重塑，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对人的欲望的开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从空间意义上讲，意味着对外在文化疆域的扩张达到某种极限之后，必须内转为拓展和开掘人的欲望、情感、想象等“内在心理空间”，在经济上就表现为消费与生产的统一。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消费和娱乐本身与生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的情感内嵌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逻辑中，这也是人文经济学的本质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做网上工作，不能见网不见人，必须下大气力做好人的工作，把广大网民凝聚到党的周围”，“做好网上正面宣传，不能搞广谱适用、大水漫灌那一套，不能‘一招鲜，吃遍天’，靠一个腔调、一种风格包打天下”。所以，从文化领域治理的角度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最终落脚点还是落在人本身这一基础之上。

在路径方法上，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坚持多手段综合发力

文化领域治理的问题与难题由来已

久，在信息化条件下，应对好其带来的挑战是对我们政治意志和实践智慧的检验。数字信息技术催生融合性文化，原本边界清晰的行业比如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相互交织涵盖，呈现模糊性特征。另外，新技术因素赋予了社会更多的行动主体挑战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能力，社会的再组织化也塑造着更多政治空间。不仅如此，新技术环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体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也发生着改变。因此，协同治理必然会成为文化领域治理的基本思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协同治理必须处理好管理者、网络平台与文化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管理者要借助平台的技术与资源优势进行“代理监管”，但重视商业利益是任何平台生存的基本逻辑。平台对文化领域的政治性基本保持冷感状态，在服从法律相关规定，保障信息安全、规范传播秩序、维护良好生态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外，并无动力与意愿主动承担政治风险，在文化治理实践中多存在失职现象，单纯依靠平台的自我规制难以有效杜绝绝对政府监管阳奉阴违的现象，所以并不能过于期待它们作为主体来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另一方面，管理者要时时刻刻加强与文化内容生产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文化领域治理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只有珍惜数量庞大的文化内容生产者及拥有的文化权力，尊重内容生产所源自的复杂土壤，才能避免对舆论环境的误判风险，才能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据主动，真正掌握文化领导权。

总之，文化领域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和系统性工程，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主体作用，广泛汇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落实好各相关方责任，实现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有机统一。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推动治理触角前置、治理流程重塑，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转变，实现管内容、管行为、管主体统一，提高文化治理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最终目的则是构建鼓励优质内容生产的文化生态。

深刻把握由风及腐、从量变到质变的本质特征，树牢全周期管理理念，把风腐同查同治理念要求贯穿案件查办、警示教育、整改纠治等各阶段，形成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有效闭环。深化个案分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透视由风及腐、蜕化变质、破纪破法的过程，列出蜕化变质的“征兆清单”，向党员干部讲清楚违规的“规”、由风及腐的“害”，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加强类案分析，做到既善于发现问题，找出共性问题、深层问题，又善于推动解决问题，推动深化改革、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把群众关注、易发多发、变异升级的风腐问题作为重点，推动风腐同查同治全流程规范、全链条衔接，真正让反复发生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

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腐败分子变得更加狡猾，贪腐手段呈现出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的阶段性特征，变得更加隐蔽复杂，必须不断探索和丰富防治的有效办法。坚持“向信息化要资源、向大数据要效率”的监督理念，筑牢监督执纪“数字底座”，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监督方式迭代升级，持续提升运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手段开展风腐同查同治的能力，整合数据资源，搭建监督模型，借助数据汇集、碰撞比对、关联分析等，认真核查异常数据和问题线索，从收集的数据中挖掘出隐匿的腐败迹象，及时发现重点人、重点事，不断提高主动监督以及发现问题线索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通过点上的腐败问题，查找面上的不正之风，更加精准地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促使查处风腐问题更加高效有力。

（作者系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改革攻坚，是年轻干部的职责所在，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改革攻坚能力，要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年轻干部更要肩负起历史责任，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主动担当作为、勇于直面问题，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改革攻坚过程中，年轻干部既要具备干事热情，又要秉持科学精神，精准识别问题根源，强化创新思维，坚持“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理性与务实精神推动改革稳步向前。

满怀干事创业的热情，是年轻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年轻干部干事干事，是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要保持闯劲、干劲、韧劲，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年轻干部因为自身肩负的职责，在各个领域承担着大大小小的任务，这些任务关系改革发展、关系人民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干事创业的热情是推动工作发展、实现攻坚克难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把责任转化为热情和动力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年轻干部从内心明确自己的责任并在工作中找准路径，将这种责任转化为工作内容。在当前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年轻干部要敢于突破固有思维，主动适应、积极作为；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淡泊名利、奉献人民的坚守。

科学精神是年轻干部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干部干事热情很高，但缺乏科学精神、求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业绩，反而带来了一堆问题。秉持干事创业的科学精神，是年轻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方法。现实中，诸如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故步自封等各种影响改革深入推进的“拦路虎”不容小觑，说到底还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多，这就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面前的困难和时代提出的要求，以崭新的思维方法和实际行动去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年轻干部要具备清晰的目标意识、顽强的进取精神，同时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制定科学的改革举措和正确的方法路径，确保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效，把改革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这就要求年轻干部强化战略思维，大兴调查研究，观大势、谋全局、明方向。在面對问题时，要冷静分析、科学研判，避免情绪化和盲目行动。在解决问题时，必须注重调查研究，确保决策和行动的精准性，客观认识问题的本质，避免“一刀切”和形式主义，切实掌握和运用好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年轻干部只有树立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决策的方法，坚持科学决策的习惯，才能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都符合实际情、符合客

年轻干部要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 沈海涛

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改革攻坚能力。对年轻干部而言，光有干事热情或者仅有科学精神是不够的。如果光有干事热情而不注重科学精神，在工作中就有可能蛮干、有可能拍脑袋决策，甚至有可能淹没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里，从而贻误战机。如果仅有科学精神而不具备干事热情，那么年轻干部在改革攻坚中就可能显得冲劲不够，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领域需要拍板的时候瞻前顾后，同样会贻误战机。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前者提供动力，后者提供方向和方法，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改革攻坚行稳致远。年轻干部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干事热情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上。做到激情与理性相结合，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唯有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干事热情才能转化为实效。做到主动担当与稳健推进相结合，干事热情让年轻干部在面对挑战时敢于主动担当、迎难而上，而科学精神则要求稳健推进，避免冒进和盲目行动。做到创新精神与务实态度相结合，干事热情推动了年轻干部积极进取，而科学精神则让创新更加务实，确保改革措施切实可行、可持续。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年轻干部在改革攻坚过程中，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仅是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应当秉持“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的原则，充分激发干事热情，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不断探索、不断进取，在改革攻坚中不断提升自我，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上接1版）

风腐同查同治要“窥一斑而见全豹”，在普遍性、反复性、顽固性问题中找点位、找切口

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质增效，坚持问题导向尤为为重要。哪些不正之风与腐败关系最为紧密，哪些作风问题最易演变为腐败，风腐同查同治就要往哪里发力。

坚持从党员干部身上的“习惯素养小事”抓起。“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当前，少数党员干部严格自律的习惯尚未养成，对一些违纪的小事小节司空见惯、习怪不怪。要从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高度来认识，一些事情看似是小、实质是大，如果不及时修补防范，必将愈演愈烈、积重难返，“小管涌沦为大塌方”。风腐同查同治就是要从党员干部身边的小事小节抓起，抓住“动点小脑筋、耍点小聪明、探点小消息、传点小谣言、走点小关系、说点小八卦、送点小礼品、得点小关照、讨点小人情、打点小报告、建点小圈子、聚点小老乡、搞点小聚会”等作风建设“细节中的魔鬼”，将少数党员干部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不良习惯、意识、行为，通过一件件“小事”整治纠正过来。

坚持从老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抓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群众痛恨“老虎”、厌恶“苍蝇”，身边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重腐蚀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损害群众对党的信任、破坏党群干群关系。风腐同查同治就是要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

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紧盯群众最紧迫的现实需要、最反感的作风问题、最痛恨的腐败现象，以“小切口”推动“大整治”，坚决查处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的乱作为问题以及推诿扯皮、玩忽职守、不思进取的不作为问题，撤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置若罔闻、对民生疾苦麻木不仁、对民生资源巧取豪夺的“硕鼠”“蠹虫”，让人民群众从一件件小事中引发对正风反腐的强烈共鸣，感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坚持从全社会关注的“社会之痛”“家庭之痛”抓起。党员干部的作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风腐同查同治就是要从社会和家庭关注的问题抓起，突出抓好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回溯倒查“小节无碍”麻痹心理、“不为人知”侥幸心理、“遇事摆平”特权心理背后可能掩藏滋生的风腐问题，探索运用“明厨亮灶”式的快查快处监督机制，点名具体人、点出具体的事，缩短监督处置与警示教育的时间差，引导党员干部时刻保持警惕、警觉、警醒，把律已正行变成自觉行动和行为习惯。

以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统筹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只纠歪风不查腐败，作风问题就难以杜绝；只治腐败不管作风，腐败治理成果就无法巩固持久。对风腐一体、风腐交织问题而言，既要在“查”上动真格，又要在“治”上见真章。

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实

践中，既要敢于“由风查腐”，深挖彻查“四风”背后的腐败问题，又要善于“由腐纠风”，注重从腐败案件中发现“四风”问题线索，严肃认真处置。深化由腐纠风，坚持凡查处腐败案件必挖作风问题，既查权钱交易、利益交换、插手干预等腐败问题，又深挖被审查调查对象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四风”问题线索。加强由风查腐，查处作风问题时，聚焦纪律规矩、权力运行、政治生态、政商关系等，着力发现和查处利用吃喝送礼搞利益交换、请托办事等问题，坚决清除隐藏在“人情往来”背后的腐败。风腐同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多方联动、同频共振、形成合力，把风腐同查同治要求融入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加强同巡视巡察、公安、审计、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横向协同配合、纵向上下贯通、一体治理的工作格局。

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推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的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机制。坚持以案看风，从腐败案件中深入分析作风“活情况”、新动向，查找本地区本领域哪些不正之风与腐败关系最为紧密、哪些作风问题容易演变为腐败，密切关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的放矢进行整治。坚持以风看腐，围绕行业、领域或地区易发多发“四风”案件，深入分析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全链条排查薄弱环节，精准定位腐败风险点。坚持风腐同治，在风腐同查基础上，必须纠树并举、破立并重，激浊扬清、久久为功，大力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破除现行制度中的弊端，着力形成长远、固根本的常态化长效化制度体系，推动化风成俗、形成习惯，为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筑牢作风防线。

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